

豐子愷

与中国现代音乐教育

◎ 陈净野 著

村学校的
音乐课



团结出版社



陈净野

与中国现代音乐教育

◎ 陈净野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丰子恺与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研究 / 陈净野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126-1616-5

I. ①丰… II. ①陈… III. ①丰子恺 (1898~1975) — 人物研究②音乐教育 — 教育史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①K825.72②J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7825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X24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49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1616-5/J • 87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浙江省教育厅资助项目
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后期资助项目

让音乐普及民众：忆我的父亲丰子恺音乐活动片断 ——代序

我父亲丰子恺从二十年代他二十多岁开始，直至1975年去世，从事艺术事业五十余年。其艺术成就主要自然在美术（漫画）方面。但他对音乐的重视与提倡实不亚于美术。他曾说过：“音乐是艺术中最活跃，最动人，最富于‘感染力’的一种”，它不像文学，“没有声音，只是静静地躺在书铺里待人去访问”，也不像演剧“限于时地”，美术“也受着与上述两者相同的限制”。唯其音乐的宣传力“普及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

1914年，我父亲十七岁时，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那里，他遇到了决定他一生从事艺术事业的老师——李叔同先生。李先生教音乐、图画。我父亲后来回忆说，他当时上李先生的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他从李叔同先生那里首先学到的是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同时也学到了音乐、绘画的修养和技巧。从此，他更勤奋于艺术学习。1921年他去日本留学，学习绘画，并旁攻音乐，学习小提琴，还参加其他音乐活动。

从日本回国后，他任教音乐达七八年之久。同时在教学之余他也从事音乐著译工作。当时教的歌，都是外国古典歌曲如《可爱的家》《故乡的亲人》等。那些学生并无音乐素养，都是初学的。但他们都很喜爱这些歌曲，一学就会。他记述说：“曲终时，数十人的教室中肃静无哗，大家都埋头在乐谱中，好像大家都被迷而入了昼梦一般。”当下课时，“大家嫌恶下课铃，就像好梦被鸡声惊醒，大家表示可惜。”这一教学印象使得他“不禁在心中惊诧音乐的感动力的伟大，不可思议。”当时他虽赞扬这些歌曲，但又不满足于此，认为“终是西洋风的”，因而又主张要“用东洋风的旋律制作这类的音乐”，才能真正成为大众的音乐。



1935年秋,他带了两个女儿在杭州山区游览,经历了一次难忘的音乐生活。游览中途忽然遇雨而入一个三家村的茶店中躲避。他借此机会欣赏“山色空蒙雨亦奇”,但见两女沉闷,就向茶店里借了把胡琴来拉。先拉了几首西洋小曲,两女和着唱,把三家村中的人都引来了。后来又拉一首《渔光曲》,这就引得三家村的青年们也都和着齐唱起来,一时把这苦雨的荒村变得十分温暖、热闹。他后来记述说,他“有生以来没有尝过今日般的音乐趣味”。又盛赞胡琴这一乐器和《渔光曲》说:“这种乐器在我国民间很流行,剃头店里有之,裁缝店里有之,江北船上有之,三家村里有之。倘能够多造几个简单而高尚的胡琴曲,使像《渔光曲》一般流行于民间,其艺术陶冶的效果,恐比学校的音乐课广大得多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年冬,战火逼近我们家乡浙江石门镇。父亲率全家老少逃难去内地。不久,我家“缘缘堂”即毁于炮火。国土被侵,家园被毁,全家客居他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自然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面对着这一大动荡的形势,我父亲并没有消沉下去,而是把这种家仇国恨化为宣传抗日的力量。正像1938年他在汉口所画的一张得意之作《大树》的题词一样:“大树被砍伐,生机并不息。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他密切关心国事,视野比过去放宽了,进一步地关注着广大群众的艺术、群众的音乐。曾写《中国就像棵大树》《谈抗战艺术》《谈抗战歌曲》等文。在《谈抗战歌曲》一文中,他热情洋溢地赞扬了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流传:“抗战以来,艺术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都市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宋代词人柳永所作词,普遍流传于民间,当时有‘有井水处即有柳词’之谚。现在也可以说:‘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前线的胜利,原是忠勇将士用热血换来的。但鼓励士气,加强情绪,后方的抗战文艺亦有着一臂的助力,而音乐实为其主力。”文章并对当时的歌曲创作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主要是指出歌词不要标语化,应含有艺术味,如像《心头恨》(“种子下地会发芽……”)那样。在歌词与曲调的结合方面,他从民族习惯的角度,主张“务使乐曲成为宣叙风的音乐,务使歌词成为朗吟式的文句”,并举《义勇军进行曲》为例来说明。除发表评论文章外,他与友人萧而化合编《抗战歌曲选》二册(成都越新书局1942年出版)。



1938年6月,我父亲任教于桂林师范。当时他教的是图画、国文两课,但他对音乐课特别关心,曾向校长建议说:“音乐最好专聘一人。此艺术有关群众精神及民气,比美术更为重要,非专请一富有艺术修养之人掌教不可。抗战建国之时尤不可忽。”又建议增加音乐课为每周两小时,“此课与体育课相似,必须团体练习,不宜个别自修,故宜照体育例始终两小时也。”于此可见他念念不忘音乐教育。

音乐是什么?音乐在生活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在学校教育中应处于什么地位?这些都是我们的前辈艺术家们曾经努力探索的问题。我父亲曾把音乐比作金鸡纳霜(即奎宁丸),说浅见的人往往把音乐只当作一种消闲娱乐,而看不到好的音乐能培养美德。好比吃奎宁丸,只知其外表的甜味,而不知其内里药物能起严肃的治病作用。音乐对民众能起严肃的教育作用,这是他一贯的立论根据。

丰元草

原载《音乐爱好者》

1979年第1期

前 言

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源远流长。作为音乐文化的传承活动与方式,音乐教育伴随着音乐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据史料记载,早在商代之前,我国就有学校音乐教育的萌芽,此后西周建立完备的礼乐制度,开创了古代礼乐教化的先河。而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我国逐渐形成和丰富了音乐教育的思想宝库,出现了《诗》《乐记》《乐论》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经典音乐文献。由于这些著述丰富的文化蕴含,它们不仅被视为儒家教育的经典范本,也对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然而,中国传统音乐在经历诸多辉煌和高度后终究于闭关自守中逐步走向了衰弱,而自汉代以来传统意义上的口传心授(耳闻口传)的传承方式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使之逐步走向日渐式微的地步。

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后,中国步入了近代化进程。中国社会处在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期,中国文化界由此展开了围绕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变”与“不变”的论争与探索。如同文学界的“诗界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一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新音乐便是在这种冲突、探索、融合中萌芽,并以学堂乐歌运动为主要形式快速发展,拉开了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帷幕。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文化界,包括音乐界因求知的方便掀起了假道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和态势。中国的音乐教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提倡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在学校中设立乐歌课,发展学校音乐教育,以此进行思想启蒙成为当时中国音乐文化思潮的主流。以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为代表的第一代启蒙音乐家取道日本学习西方的音乐理论,积极进行学堂乐歌创作,组织音乐社团,办起了音乐



杂志,回国后致力教育事业,对中国新音乐的发展立下了“蓝筭开山之功”。而“真正使中国新音乐开始走上成形发展之途并奠下最初几块基石的,则是在‘五四’以后至大革命时期出现的一批音乐家”。^① 丰子恺便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位。

作为李叔同的三大弟子之一,人们更习惯称丰子恺为艺术大师,其创作、著述涉及文学、绘画、音乐、翻译、书法、艺术理论等诸多领域且影响深远。探寻丰子恺的艺术轨迹不难发现,他的一生与中国音乐教育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就其音乐成长的经历而言,幼时学堂乐歌的熏陶,使他多年后仍时常回味并体验到“纯正热烈的爱国的心情”,而在遇上李叔同时,他接受了类似“学院派”的专业音乐教育,在学习技艺的同时,也形成了“先器识而后文艺”的音乐教育观,为他一生的音乐艺术事业奠定了基础。1919年毕业后,他与同人一起创办中国第一所私立艺术师范学校——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发起创立中国第一个美育社团——中华美育会、编辑出版《美育》杂志等,意在“鼓吹艺术教育,改造枯寂的学校和社会,使各人都能够得到美的享乐之一种利器”。这些早期立足于中国现代美育探索的教育活动,使他此后的音乐教育实践和思想也有了不同的旨趣与意味。

丰子恺早期致力于学校音乐教育,1919年至1943年间,他先后任教于十余所学校,足迹遍及上海、浙江、桂林、遵义、重庆等地,任教时间长达20余年。从其学校音乐教育实践活动的教育对象和层次来看,有艺术师范学校、中小学和大学音乐教育;从教学活动的性质来看,有专业音乐教育和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其中以普通学校音乐教育为主。他注重技艺与育人的结合,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也为当时的音乐教育培养了师资;自1925年12月第一本音乐读物《音乐常识》出版后,其音乐教育事业的重心逐渐转向更广泛的社会音乐教育,他利用手中的笔,耕耘于大众音乐教育的园地。其一生编译了40余种音乐理论书籍和教材,对普及和提高新音乐教育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为了实现普及艺术的教育理想,他变卖家产筹资办学,在所办学校缺少资金而运转困难时,他主动不支取酬金,以奔波、兼教于多所学校谋求生计;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以53岁的高龄开始学习俄文,翻译了一批包括幼儿音

^① 陈聆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20世纪——陈聆群音乐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40-341页。



乐教育、小学音乐教育、幼儿师范教学、师范教学、青少年通俗读物等诸多内容的音乐书籍,他以教育家高度的责任感,为新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努力。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分为两个时期:1840—1919年为近代,即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为现代,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① 丰子恺的音乐教育实践起步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在1925—1949年之间形成高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音乐实践是其音乐事业的延续,故以“现代”为主要始点和线索来考察其音乐教育实践应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丰子恺音乐事业的研究,1949年前主要在评论层面,颇具代表的是对其所著的《音乐入门》等各种音乐读物的介绍和评论。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丰子恺后人和友人相继发表了若干回忆其音乐事业的文章。如丰元草(《让音乐普及民众:忆我的父亲丰子恺音乐活动片断》1979)、丰一吟(《丰子恺晚年的音乐生活》1981)、钱青(《丰子恺与石湾振华女校》1982)、丰陈宝(《丰子恺与音乐课》1998)等等。中国音乐史学界也逐渐重视对丰氏音乐事业成就及音乐思想特点的评价和研究。如向延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1994)、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2005)、孙继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2004)、夏滢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简编》2004)、余甲方(《中国近代音乐史》2006)、伍雍谊(《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2011)等分别对丰子恺的一些音乐活动、主要译著、音乐教育与美育思想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介绍,肯定了他对现代音乐知识的普及作用。其中也指出他的译著存在着一定的不足^②。近年来,随着丰子恺研究事业的推进,丰子恺音乐教育研究有所细化,但仍显不足。如通过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清华同方)可见,国内1979—2012年间关于“丰子恺艺术”的论文50篇,主要涉及丰子恺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教育思想等;检索“丰子恺音乐”可查论文7篇。另有学者在研究丰氏艺术思想论著中论及丰氏在普及音乐知识方面的贡献等。这些皆为丰子恺音乐教育研究奠定了基础或具有启发意义。本书依据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收集的丰富资料,首次对丰氏一生的音乐行迹进行分期梳理,拟在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大背景下对

① 马东风:《音乐教育史研究》,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07页。

②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89页。



丰子恺与中国现代音乐教育

此课题作整体性的学术研究。拙著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丰子恺与清末民初的中国音乐教育;丰子恺音乐教育实践及其主要业绩;丰子恺主要音乐著述分析;丰子恺音乐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的特色和历史地位;丰子恺音乐实践年谱;丰子恺音乐理论著译及音乐创作目录等。由于个人学术水平与条件有限,只想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能为丰子恺音乐研究尽一些绵薄之力。



目 录

让音乐普及于民众:忆我的父亲丰子恺 音乐活动片断——代序 丰元草	1
前言	1
第一章 丰子恺与清末民初的中国音乐教育	1
第一节 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	1
第二节 清末民初中国音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13
第三节 清末民初音乐教育背景下的丰子恺	24
第二章 丰子恺音乐教育实践及其主要业绩	38
第一节 “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与“中华美育会” ——丰子恺音乐教育事业的起步	38
第二节 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 ——丰子恺学校音乐教育事业的艺术家园	58
第三节 从立达学园到开明书店 ——丰子恺社会音乐教育事业的拓展和转型	74
第四节 “艺术的逃难” ——丰子恺于抗战时期的音乐教育实践	103
第五节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音乐著译 ——丰子恺音乐教育事业的延续	109



第三章 丰子恺主要音乐著述分析	116
第一节 音乐理论	116
第二节 音乐技术理论	133
第三节 歌曲	144
第四节 器乐	154
第四章 丰子恺音乐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的特色和历史地位	161
第一节 丰子恺音乐思想的美学渊源	161
第二节 丰子恺音乐思想的基本内容	171
第三节 丰子恺音乐教育思想的特色	182
第四节 丰子恺音乐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地位	201
附录一:丰子恺音乐实践年谱	214
附录二:丰子恺音乐理论著译及音乐创作目录	239
参考文献	249
后记	254



第一章 丰子恺与清末民初的中国音乐教育

第一节 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 社会、政治、文化背景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曾多次面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外来文化冲击的考验，但较之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根深蒂固以及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故即使是如明清之际的历史大变动也未能最终动摇其基本格局。但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以及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关税协定等等促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由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性转折。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外来西洋文化空前的冲击和挑战。

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民族半殖民化的苦难，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以及长期积淀的民族自尊心促使了近代中国民族的觉醒。继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之后，一些有识之士在重新审视自身的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外来文化的认识和评估，他们深刻认识到，中国唯有向西方学习包括“软文化”在内的文明，才能实现民族命运的复兴。严复认为：“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① 梁启超则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

^① 严复：《论世变之亟》，见陈飞、徐国利主编：《回读百年——20 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 6 月版，第 101 页。



在变官制。”^①在对“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进行深刻反思后，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教育等制度方面的变革要求，并通过组织学会、创办刊物等途径宣传维新思想，传播西方文明，掀起维新运动。就在丰子恺出生的当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革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实行“戊戌变法”。虽然变法以失败告终，但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其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层面的意义是深远的。诚如学者所言：“新学家们带来的解放作用远不是西太后发动的政变所能剿洗干净的。从这时候起，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已经出现。……他们处多灾多难之世，怀忧国忧时之思；向西方追求真理，为中国寻找出路，成为最自觉的承担时代使命的社会力量。他们在维新运动中的种种实践活动，为后来的改革留下了历史起点。……而短时间里纷纷兴起的学会，则兼有学术与政治两重意义。它不但使习惯于一家一户的中国人看到了‘群’的形式和力量，而且各依其不同的具体宗旨，为广开中国的民智而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在近代中国知识几乎必然的会转化为政治力量。”^②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宣告了封建帝制的结束。然而，就国内形势而言，辛亥革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革命成果被窃取，列强继续横行，社会仍然黑暗，人民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从国际形势来看，西方列强进一步加快瓜分世界领土的步伐，1914年至1918年间于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接近于彻底崩溃的地步”。战争彻底暴露了西方近世文明的各种弊端和矛盾，西方近代文明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这使许多对西方文明抱有迷信和期望的中国人清醒下来，“原先一心一意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先进知识界开始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新的反省，提出了不同的中国近代化—现代化道路”。^③在此背景下，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发生了

^① 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见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5页。

^②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168页。

^③ 李维武：《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8页。

巨大的变革，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包括文学、教育、艺术在内的整个人文学科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一、文界革命与“人的文学”观念的形成

近代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促使传统文学开始转向，其中既有矛盾、冲突，也有会通、融合的一面。从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士大夫的普遍文化心态从开始对西方“器物”等自然科学的认识逐步转变为对西方政治制度、民主观念的关注。社会西方文化的传入特别是随着翻译文学的兴起，打破了士大夫们长期封闭的文化环境，他们得以放眼世界文学，从而对西方文学艺术经历了一个由轻视转为惊奇、赞叹乃至萌生学习意向的过程，中国文学界内部逐渐萌发了以欧美、日本为榜样的文学革新的需求。与发愤图强、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相一致的是，以文学为武器反映社会现实、抨击时弊，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主义思想成为近代文学思想中的鲜明特色；求新、求变的文艺观直接推动了文学体系的历史性转变，晚清文坛上逐步掀起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使近代文学逐步打破了以诗文为中心的传统文体格局，形成了以小说、戏剧、诗歌三位互为依存的现代文学体系；^①由典雅的文言文向通俗、简洁、流畅的文学语言发展方向成为一个自然趋势，“主张言文合一，倡导文学的通俗化”，“用白话作新文学”的路子^②逐渐推动平民文学的发展。从晚清文人龚自珍、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到章太炎、柳亚子，再到“五四”时期的胡适、鲁迅、郭沫若、刘大白等，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经过无数知识分子的努力，逐步实现了自身现代化的转向，而在“五四”之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叔本华、尼采、黑格尔、康德、杜威、弗洛伊德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纷纷传入我国并逐步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重要营养源泉。正如茅盾所言的：“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

^① 郭延礼：《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74页。

^②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504页。

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该是更注意些的目的。”^①文学家们积极汲取西方哲学文化的精髓，并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政”^②的方法研究文学，一时间，各种主义交相辉映，精彩纷呈。其中，科学主义精神与人道主义精神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进而推动了基于个人主义的“人的文学”的新文化观念的形成。^③继改良主义文学观之后，不论是周氏兄弟提出的“改造民族之魂”的“人的文学”的启蒙主义文学观、之后进而推介具体化的“平民文学”的人道主义文学观，还是胡适的以“实用主义”思想与以“历史进化的文学观”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等，皆维护人的生命存在，倡扬人性、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和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相统一的新的文学观念，彻底颠覆了以伦理文化和专制主义为基础的旧文学，实现了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饱含着个性主义内涵的人文主义，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表现的‘原道’。”^④这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呈现出“活的文学”与“人的文学”的时代特点。^⑤

二、科学主义的崛起与人文主义的论争

19世纪末开始，中国思想界逐步将思想文化问题放到改造社会乃至国家前途、命运的首要位置。人们逐渐认识到，如果不根本变革传统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就难以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就具体到人生观的问题，即建立怎样的人生观才能有助于“兴国”与“救国”的历史使命。在此基础上，“科学”与‘民主’粉墨登场，一股提倡“物用科学”以救国，宣扬用科学方法改造传统的科学主义迅速崛起，并

① 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载《小说月报》第12卷2期，1921年2月10日。

②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转引自郭延礼：《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5页。

③ 方习文：《五四文学思想论稿》，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6-16页。

④ 同上，第6页。

⑤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见《胡适全集》第1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277页。

